



# 政治的經濟與經濟的政治

徐柏園

——近代歐美政治與經濟勢力之變遷

## 一 政治與經濟的關係

政治是保障並改進人類生存的一種方法，最初人類要和禽獸爭生存，知道非團結不足以制敵，於是結成團體，推年富力強，精明幹練者爲之長，這是土酋組織的開始，也就是政治組織的雛形。人類還得與自然相抵抗，擴充生存的範圍，如避風雨，通水陸，改熟食，增糧產等等，中國古代史有神農，有巢，燧人諸氏的記載，正與今日之愛迪生，亨利福特等大發明家相輝映。不過當時的社會比較簡單，故神農有巢等均同時佔政治上的最高地位，而今日之亨利福特等則間接操縱政治之變化而已。上列兩種需要所形成的政治組織，還不算十分強固，人與人爭生存的事實，纔造成最明顯最穩固的政治組織。人類互鬪的主要方式，一是團體的，如部落與部落，國家與國家，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鬪爭。96611 凡是政治組織愈完密者，勝利的可能也愈大。一部世界史，便是政治組織散漫的團體，被組織強固的團體併吞踐踏的記載。另一方式是個人

之間的。最重要的便是爲財產權（也就是生存工具）而引起的鬪爭。凡有良好的政治組織，限定個人之間鬪爭的範圍，並能有力地防止他們越出範圍之外者，其社會便容易走上生利的積極的途徑，避免各種破壞，總之，不論從人與獸爭，與天爭，或人類互爭的種種過程看，政治組織都是勝利的先決條件，政治組織愈強固愈優良而又很廣大者，團體與個人的生存機會也愈多愈好，比如今日之白種人。反之，團體的生存，固不免發生問題，個人之生存也必因團體破壞而遇厄運，美洲之紅人，非洲的黑人，是最好的例證。

不過我們必須認識，政治本身只是一種方法，目的在求人類的生存，和改進人類的的生活，倘若政治違背了人類生存的目的，或者泄泄沓沓，不能改進人類的的生活，那種政治組織，遲早會被人丟棄；逐步改革，或用暴力推燬。

人類生存的主體，屬於經濟，經濟雖不能包括生存的全部，至少可以代表其大部份。籠統些說，經濟包括人類求生存與改良生活的一切

966 12 物質的活動。衣、住、行，是人類生存的四大綱要，生產、交易、分配、消費，是經濟活動的四大骨幹，生產尤為一切活動之主體，原始人類，最初莫不集全力於糧食之覓取（生產食糧），然後製衣造屋，研究交通工具。生產有餘，纔談得到交易，生產關係複雜化，團體化，纔發生分配問題。消費之是否應當，是否經濟，是否衛生等等，又為更進一步的問題。救死不暇的社會中，常顧不到的。不過人類既得生存，還要進一步以求生活之改善，人類之能超越萬物，即在其能不斷地求進步；人類社會一切問題之所以繁複化，也就是因為人類對現有一切，常引為不滿。在人類改進生活的掙扎中，不論是經濟的或非經濟的一切方法和制度，凡能促進大多數人之利益者，那種方法或制度一定被採取。反之，凡不能促進大多數人的利益，或妨礙大多數人之利益者，決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採取，即採取後也必被推翻。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乃是一切方法制度取舍抉擇的準繩。

照理，政治設施，應隨時適合經濟的需要，保障大多數人之生存，補助大多數人生活之改進。至少也應做到對外抗禦侵陵，對內保障安寧的地步。不以經濟需要為條件的政治，就是違背人類生存和生活改進的政治，不但社會受其大害，政治本身也必歸於燬滅。聰明的政治家都不會忘卻政治應適合經濟需要的道理。可惜中國歷史並不曾給予我們多少理想的事實，而少數人却持政權，濫施威力壓抑大多數人民經濟利益之發展，剝削其勞動所得以維持統治階級之揮霍的事實，則比

比皆是。歷來幾十年幾百年一次的紊亂，顯然是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受當時黑暗政治壓迫過甚而起之反響。當其攘臂一呼，揭杆而起，未嘗不想創造一個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都比較公允的理想世界。不幸結果每與期望相反，未亂之前，生活固然苦惱，一亂之後，更如火上添油，鬧得流離亡散，餓殍載途。因大多數人民之意志薄弱，沒有勇氣再找出路，少數野心家便乘機劫奪，於是如此這般地又捧出一位「真命天子」來！以經濟利益反抗政治壓迫始，仍以全民經濟命脈奉請帝皇胥吏宰割終。多數人之懼怯苟安，和少數人的野心自私，造成一部循環往覆的中國史，擾攘幾千年，政治是舊曲新彈，經濟始終沒有進境。

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也是少數却持政權，宰割多數利益的局面。希臘、羅馬先後崩頹，繼之以僧侶和封建主割據的黑暗世界。文藝復興後，政教分離，封建制度破壞，人民的經濟利益，纔得到相當發展。但文藝復興的勢力並沒有發展到可以抑制愚笨的野心家之產生的程度。所以德意的自由城產生了一批阻礙工商業發展的行會。而且把國家政權，分得零零碎碎，隨後馬志尼等統一意大利，俾斯麥統一德意志，不知化多少鐵與血。英法王權的提高，更造成路易十四查理第二等的橫暴淫奢。英法王室權力之提高，原應人民經濟利益之要求，制裁封建主之人自為政與互相爭擾。但這隻捕鼠的貓兒終於變成吃人的猛虎，他們利用人民經濟利益所接成的梯子，爬上最高寶座時，便把那梯子丟掉，他們獲得絕對的政權，即利用政權宰制人民的生活。

這樣的宰制，當然不能維持久遠，他自然而然地引起一般人民的反抗，爆發為革命。革命以後，如仍回到老路上去，僅僅捧出另一個帝王來，那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便無足述。近代歐洲人（包括美國等）之所以特放異彩，乃在他們能另找出路。英國的農民革命，確立了議會政治；法國的民主革命，與美國之獨立運動確立了共和政治；俄國的社會革命，也似乎能確立一種歷史上得未曾有的政治制度了。較之我國以往循環往復的「真命天子」式的革命，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使吾人慚愧！

近代歐洲人何以能另找出路，不致於變革之後回到老路上去呢？主要原因，乃在他們能抓住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來支配政治設施的原則。要明瞭近代歐美政治經濟兩種勢力的消長情形，可分作三個時期說明之：

(一)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是經濟受政治支配的時期。大多數人民受君主之宰制剝削，經濟活動，不能自由發展，當時的經濟學不成為獨立的科學，而是政治學的補助品。

(二)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是經濟與政治分道揚鑣自由發展的時期。政府以不干涉人民經濟活動為原則。人民則一方面參加政治活動，一方面企求經濟利益，兩者不相妨礙。經濟學也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

(三)自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今日，是政治受制於經濟利益的時期。

經濟的地位，駸駸然超越政治而上之。政治人物，不得不放棄其傳統觀念，而以公平的經濟原則，從新估量各種政治主張的價值，從新規劃各種政治設施。經濟學逐步侵入政治學的範圍，其精髓漫漫注入政治學中，便成爲一種表達經濟利益與經濟主張的工具。

這樣劃分時期，自然有些牽強。史家敘述社會的變遷，都有同樣的困難。要知時期的劃分，在求討論的便利，決非絕對的。劃分原則，以主要趨勢為準。比如說現代是火車輪船交通時期，但人力車，獨輪車，騾車，馬車，人轎，汽車，飛艇，三板，帆船各色各樣，同時並存，不過火車輪船，是近代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已。同樣的，我們對於時代的劃分，只取其能代表一時代之趨勢者爲主。下列幾段，乃就學理與事實兩方面說明這三個時期的特質。

## 二 第一時期——政治的經濟

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經濟學不成爲獨立的科學，大多人民的經濟利益，爲少數的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所支配。不過聰明的哲學家，不忽視經濟的勢力，聰明的統治者，知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的道理，不致過分違反人民經濟利益而已。比如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中，把國民分作三等：哲士，戰士，和商人，他最執心商人階級擡頭，支配國政。亞里士多德更認識政治不能離開經濟，他以爲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須適合國家財富的發展，但他贊揚農民，輕視商人，認爲農民

穩重勤勞，而商人則浮誇好亂。以後十五世紀的強權主義的政治學者，馬基范力 (W. Machiavelli 1469-1527) 也承認工商團體之重要，主張政府玩弄些手腕，使工商團體之間，競爭火併，免得他們聯合起來，與政府為難。他認為政治是統治階級的特權，不容人民過問的。

歐洲自十六世紀以後，思想界蓬蓬勃勃，有如我國之春秋戰國時代，但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歐洲思想界的代表者，多半是政治學家。其次是文學家和科學家，卻沒有經濟學者。當時著名學者有如霍布斯 (T. Hobbes 1588-1679) 孟德斯鳩 (B. Montesquieu 1689-1755) 盧騷 (Rousseau 1612-1778) 洛克 (J. Locke 1631-1704) 休姆 (D. Hume 1711-1776) 格勞秀斯 (H. Grotius 1583-1645) 潘芬道夫 (Pufendorf 1628-1689) 斯賓諾沙 (B. Spinoza 1632-1677) 路得 (M. Luther 1483-1546) 培根 (F. Bacon 1561-1626) 密爾登 (J. Milton 1608-1674) 沙氏比亞 (W. Shakespeare 1564-1616) 福爾特爾 (de Voltaire 1694-1778) 牛頓 (J. Newton 1642-1727) 沒有一位是經濟學家，而且除孟德斯鳩 盧騷外，多半是為學問而學問的純粹學者，因文藝復興之啓示，他們看得見教會的罪惡，和封建主的病國羸民，但他們看不到工商界的痛苦，尤其看不到剛從農奴制度解放出來的農民的痛苦。在君權神授的觀念沒有剷除之前，農工是注定要供給統治階級的揮霍的。這時的大智慧家，也跳不出這思想的界限。他們的學術文章，多受統治階級支配一

切的大原則所限制。他們不屑研究如何改進大多數人的生活的方法，尤其沒有勇氣追問少數統治階級是否應當操縱多數人的生命財產。但這時也有一批討論經濟問題著稱者，那就是重商學派。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一四九八滑斯哥發現東亞航路後，歐洲各國從事海外殖民貿易之風漸盛，海外貿易漸引起社會的注意，尤其是當時以海外開發為發揚國家威權的君主。於是重商學派應運而生，他們認國外貿易比國內貿易重要，一國的利益必須從犧牲他國的利益中得之。鼓吹輸出必須超過輸入。那樣可以賺別國的金銀，一國的金銀存儲愈多，國力愈富。意大利的晒拉 (Serra) 於一六一三年發表的國無鑛藏而能充滿金銀之原因考一文，反復說明一國經商可以致富之原因，可為重商學派的代表。

在德國，有財政學派，幫助菲立特大帝整頓稅收，振興工商。他們和重商學派微有不同，不重視國外貿易，而注重國內財富之開發。

這兩派人，都談經濟問題，但都不能稱為經濟學者，他們只是帝王的經濟顧問，聚斂之臣。他們的經濟思想，完全受制於當時的政治勢力。遠不及談政治，談哲學，談宗教者之能獨樹一幟。我們研究當時的思想，可以證明當時大多數人民經濟利益之被人忽視，與學者之不注意經濟問題。經濟思想被政治思想遮掩着而不能有所表見。

再看當時的事實，更可證明少數人之政治利益之超越經濟利益。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的歐洲，是君主政權無限擴張的時代，他

們一方面解脫教會的束縛，一方面消滅封建主之割據，權力一天天擴張。法國路易十四之「朕即國家」，十足地反映出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君主之驕橫。他們有全權宣戰媾和，有全權派糧徵稅，有全權干涉工商事業，有全權生殺一般人民！政治活動和設施之最大目標，便是如何維持或擴張君主的權力。當時各國的政治設施，與國民經濟有直接關係，約有下列幾項。

(一) 不斷的戰爭，如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六至一六四八）、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波蘭王位承繼戰爭（一七三三至一七三五）、奧大利王位承繼戰爭（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七年戰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和英、法、荷、西等在殖民地之戰爭，鬧得歐洲殺氣衝天，人民死亡流散。但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王位的承繼，領土的擴張，亦即爲滿足帝王們貪婪無厭之野心而已。

(二) 競爭殖民地，自哥倫布、滑斯哥先後發現美洲和東亞航路後，歐洲人對世界的觀念，突然擴大。各國帝王，尤其野心勃勃，想從這種發現中，獲取最大的利益。於是第一步開始，海外貿易權之競爭，第二步更挾其槍砲艦隊，搶奪殖民地。葡萄牙、西班牙，最先享受海外殖民貿易之利益，但不久即遇到荷蘭、英、法等勁敵。於是戰爭乃不可避免。被侵略的美洲與亞洲，固受其蹂躪踐踏，而歐洲各國的一般人民，也不會享受任何好處，反因殖民地之戰爭和保護，增加賦稅負擔。所滿足者，也只是帝王們貪婪無厭之野心而已。

(三) 苛捐雜稅。各國君主既愛窮兵黷武，國庫收入之增加自爲最急要的問題。我們於思想界已看到英法的重商學派，與德國的財政學派，事實上便是當時各國的提倡海外貿易，希圖賺進他國的金錢，和不斷地增賦稅負擔。當時賦稅很繁重，但又不公平。統治階級，以人民賦稅供揮霍，自不消說。特權階級，如貴族僧侶等則多半免稅。最苦的便是一般人民，他們手胼足胝，日夕勤勞，僅足供官吏之胥索。這種情形，在法國尤爲嚴重。據英國一位學者計算，自路易十四以後，法國農夫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二，須繳給君主僧侶和貴族地主。工商業者，一樣受害。三里一關，十里一卡，阻礙工商業之發達，與我國之釐金無異。

(四) 人民經濟活動備受限制。這種制限，可以分爲三類，一是政府直接制限工商業者，比如法國的哥爾白 (colbert) 政策，如要適合國外的市場，把國內工藝出品的質料，格式，長短，顏色等等都死板板地規定，阻礙出品之改良。二是政府對於工商事業間接的阻礙，如不斷的戰爭與內地關卡等。三是政府承認各種干涉人民經濟活動之社會團體的存在。當時各業都有行會 (guild) 規制極嚴，凡不屬於某行會的人，不能做那一行的營業，屬於行會的人，又須受同行的限制，出品多少，式樣顏色等，都得服從同行相互的限制。英國自十七世紀末葉後，這種限制，已逐漸廢除，但工商界之自由人與行業人 (free man and trade man) 之分劃仍嚴，不屬行業而經營那行業者，常被行業人破壞。發明蒸汽機爲近代工商業開新紀元之詹姆士瓦德 (James Watt) 17

96616 36-1813) 卽因不是行業人，不敢在外露面，而躲在一所大學裏開修理舖者。

總之，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歐洲，乃是少數包辦政治的特權階級的世界。大部份人的經濟生活，均受政治力之支配壓迫。他們不能表達任何根基於經濟利益的主張，他們的幸運，非他們自己所能支配，而定於宰割他們的君主貴族僧侶等。自然，十六世紀後歐洲各國的殖民地競爭，多半出於經濟的動機。但這種經濟的動機，乃是少數統治階級謀保持或擴張他們的統治權的經濟動機，與一般人民求生存或求生活改良之經濟動機完全不同。他是受着政治力支配的。所以我們說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歐洲的經濟思想，（如果有經濟思想的話）是政治思想的附屬品。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常爲少數人的政治利益所犧牲。

### 三 第二時期——經濟與政治分頭發展

第二時期的到臨，便是歐洲近代文明的開始。一時代文物之發揚，自然繁複萬端，但我們也可以溯本尋源，找出其最基本的原由，與最普遍的特點來。歐洲近代文明發展的最基本的原由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卽哲學思想與科學方法上之懷疑主義與實驗主義，從新衡量已知的一切，不斷地研究未知的一切。而其最普遍的特點，則爲政治的自由與經濟的自由。政治自由解除了統治階級的壓迫，經濟的自由，鼓舞着

人人利用其才智能力發展個人的幸福。達爾文的生物互競適者生存的學說出，經濟自由主義，更得到有力的旁證。

經濟自由主義的鼻祖，無疑的是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但在斯密之前，法國的重農學派，實爲經濟自由主義的先驅。重農學派發生於法國，不外二因，一則哥爾白政策抑制人民經濟活動最力，容易引起反動。二則政治的民主思想與個人主義，在法國比較普遍，容易引起經濟自由的要求。他們很相信自然律 (Law of nature) 認爲人類一切經濟活動，應聽其自然，不必加以任何干涉。許多個人的自由經濟活動，不知不覺地會造成一種自然秩序 (natural order) 自然秩序一定比人爲秩序好。所以他們的口號是聽其自然，聽其自由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與重農學派針鋒相對的，他們特別謳頌農業。以爲只有農人是真正生產者，因爲只有土地能生產，工人商人，不過改變方式，慙慙有無而已。所以他們主張將國家資本，儘量用於農業，倣效中國，以農業爲立國基礎。並主張取消各種租稅，單徵土地稅。對於政治，沒有積極的主張，只要能保護人民財產，不干涉個人經濟活動者，都不反對。重農學派領袖桂思耐 (F. Quesney 1694-1774) 在歐陸頗有影響，俄、奧、瑞典的君主，均曾折節請教。都考 (J. Turgot 1727-1781) 的影響也大，曾任法國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主張改良稅制，一七七六年，曾提議禁止城市各種行會，和廢止農夫的徭役 (corvée)，凡修橋築路，改良農村的費

用，應由地主負擔。

重農學派揭櫫經濟自由，實不亞於斯密，可惜他們偏重農業，不能對經濟現狀，作一公平正確的說明，所以近代經濟學的領導地位，還得讓給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名著「原富」於一七七六年出版，他更有力地主張個人自由競爭與國際自由貿易。斯密學說的特點，多為前人所未道者，試舉其例：

第一，他認定土地不是財富的惟一原因，勞力纔是生產的基本。他很勇敢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不勞動的人不生產；凡是勞動者，不論爲工，爲農，爲商，爲士，都是生產者。不同者生產之方式而已。蓋生產並非指物質之增加，而是效用的增加。農人耕種土地，收穫穀麥，自是生產，木匠鋸木製桌，改變樹木之形式，便於使用，也是生產，因爲他增加了樹木的形式效用。推而至於醫師，警察，美術家，音樂師等，只要他能供獻一種效用，也都是生產者，不過是間接的生產而已。斯密之學說一出，重商重農均顯見偏狹不全。

第二，他鼓吹分工合作的效能。凡製造一件物品，如果從頭至尾由一人完成，所需之時間，一定比每人分製一部的時間總和多些。他舉製針爲例。證明分工的效能。近代工業製造，沒有能脫離背他的原則的。他的分工原則，不但適用於一件物品之製造，並推而廣之，主張行業分工，地域分工，國際分工。但分工必須避免外來的阻礙，所以他主張個人自

由競爭以至國際自由貿易。

第三，他以需要供給原理，解說各種經濟現象。物價之漲跌，視社會需要之大小，與生產者供給之多寡而定。需要與供給並增並減，物價均不致有變動。需要超過供給，物價自然升漲反之。供給超過需要，物價便難免跌落。個人在社會中自由活動，惟利是趨。物價漲的，可以牟利，他們自然會爭着去生產，適應社會的需要。這樣，個人固然獲利，社會也得其所需。個人爲自利而生產，卻同時利及社會。反之，需要減少，（或供給過多）物價跌落，個人爲避免損失計。自然減少生產，社會也不致有過賤的物品。這樣，個人固然減少損失，社會也減少其不需要的東西。個人保護自己的利益，卻同時保護社會的利益。社會上人人爲利已而作種種經濟活動，結果莫不利己利人。不必人力指揮，冥冥間自有需要供給的關係在那兒支配。所以斯密大聲疾呼地主張自由競爭，因爲自由競爭可以不化一文錢，不費一分力而造成最理想，最能適應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自然秩序。

斯密要說明他的主張，尤其是需要供給的關係，不得不就一般經濟現狀作最縝密之分析，完成他的巨著，於是經濟學乃成爲一門說明經濟現狀的科學。

還有，我們應該記取，斯密經濟學說的骨幹是自由主義，而其學說的出發點，則爲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競爭與私有財產兩者，實形影相隨，不能分解。必社會承認其享受競爭所得之結果，而後個人願意競爭。所

18 以斯密認為良好的政府應竭力保護個人的財產，保證其競爭之所得。斯密後來的經濟學者，除社會主義者外，無人能越出自由競爭與私有財產的範圍。如馬爾薩斯 (T. R. Malthus 1766-1834) 之人口論，

黎卡杜 (D. Ricardo 1772-1823) 之論地租，邊沁 (Bentham 1748-1832) 穆勒 (J. S. Mill 1806-1873) 之效用論，馬謝爾 (A. Marshall 1842-1924) 關於需要供給原理之闡發，以及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和動的經濟學的陳說，均各有所長。但就其大體論，只是修改或補充斯密的主張而已。

這一派的經濟學者，普通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其實斯密提倡自由競爭，並想不到資本主義發展得這樣快，尤其想不到資本主義的弱點暴露得這樣快。要知自由競爭益以私產制度，不一定產生資本主義。否則中國人民享受經濟自由與私產保護，不為不久，何以不能取歐美資本家之地位而代之？希臘羅馬時代之歐洲，何以也不能產生大資本家。近代資本主義能從自由競爭與私產制度中孕育出來，至少有三種特殊的原因：(一)歐美民族性之一往無前，(二)市場之推廣與交通工具之進步，(三)工業革命與科學界不斷的發明。這樣，基於私產制度的經濟自由主義乃一變而為資本主義。變化之劇，實非斯密所及料。以後的經濟學者，不願經濟事實之變遷，仍拘泥於斯密之學說，只就現狀說明這是什麼，那是為什麼，而不敢說這應該如何，那應該如何，相形之下，未免落後耳。

但就斯密本人論，他實在是一位思想的創造者。他把經濟學從政治學中分出來，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他研究的對像不是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是多數人民的利益，他很勇敢地反對當時統治階級干涉人民經濟活動，提倡經濟的自由主義，他的經濟主張，以個人爲單位，以世界爲一體，而不願有國家存在其間。從斯密以後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乃分頭發展。

就事實論，我們看見三件大事，爲這時期的先導，那就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和法國的民主革命。

工業革命就是以機器代替人工，歷史家常以瓦德把他人所發明的蒸汽機向政府註冊的那一年（一七六九）爲工業革命的起點，瓦德的蒸汽機，最先僅用於抽吸煤礦之積水，十餘年後，逐漸爲英國棉織業所採用，蒸汽機用於製造，自棉織業始，隨後福爾登 (R. Fulton) 於一八〇七年發明輪船，斯蒂芬孫 (G. Stephenson) 於一八二五年發明火車，均應用瓦德的蒸汽機。蒸汽機之用遂廣。與瓦德的發明同樣重要的，有哈格里夫 (James Hargreaves) 於一七六七年發明的紡紗機。卡特雷得 (Cartwright) 於一七八四年發明的以水力轉動之織布機和美人忽得耐 (Eli Whitney) 於一七九二年發明清棉花子的清花機。有這許多發明，英國紡織業乃得到長足的進步，但初期工業革命改變工業組織與增加生產效率之程度尚淺，其影響於一般人之經濟信仰者則甚大。一方面，解脫一般人對於舊有方法之拘泥，他



方面鼓舞着大家追求更新的發明，更巧的方法。各人想發展各人的天才，促進經濟自由的信仰。

一七七六年美國的獨立運動，自然有許多原因，但最主要者，乃是當時英政府限制殖民地人民經濟活動過於嚴格。美洲殖民地出口貨物，必須先運到英國，然後由英轉賣於他國。他國貨品，也不能直接輸入殖民地。同時，英人爲保護本國工業計，竭力阻礙殖民地工業——鍊鐵工業——的發展，而賦稅則一天天加重。殖民地工商界忍無可忍，終於宣告獨立。所以美國的獨立運動，表面是政治革命，實際上乃求經濟解放。獨立告成，頒布憲法，很明白地規定，政治以分權自治爲原則，經濟以個人自由爲原則。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經濟活動之自由，非法庭不能加以任何限制。平民固然不能干涉他人的經濟活動，政府亦復無權干涉，甚至代表民意的議會，也不能規定任何限制個人經濟活動的法律。最高法院常以妨害商業與不合憲法等理由，推翻議會全體通過的案件。

「不自由無寧死」是一七八九年法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口號。「自由」包含兩種意義：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表面上，政治自由，似乎是法國革命的最大企圖，實際上，卻以經濟解放爲骨幹。當時法國人民，受君主貴族之壓迫，加以災荒饑饉之頻繁，真是謀生無路，求死無門，忍無可忍，繼霹靂一聲，「衝進巴士的獄去！」他們所要求者是自由與麵包，不是政權王位，是解除各種苛捐雜稅的負擔。不是想搶奪政府官

吏做。人權宣言，很明確地規定人民有生命財產之自由，非經法律手續不能侵犯。政府不能任意徵收賦稅，須經代表人民之議會通過，而其用途也須受議會監督。諸如此類，都足證明法國革命的動機，實在是經濟的。還有，普通人常稱法國革命爲中產階級的革命，亦不甚妥，當時革命的主力軍，原是一般受政治壓迫的窮苦人民。可惜革命告成他們過於興奮，發狂地享受「自由」，無暇細心理會個人的利益，中產階級纔乘機而起，收其實益。說革命的結果爲中產階級侵占，說革命是中產階級主動則不可。

這三件大事，是自由主義的碩果，也是自由主義擴大的原因，從此歐洲成爲「自由」的領域，政治的自由，保障個人經濟活動之自由發展；經濟的自由，補助民主政治之實現。雖說歐洲也有未經過同樣改變的國家，但「自由」的趨勢，則很普遍，成爲當時的天經地義。

從歷史事實看，我們不能否認經濟自由所給予大多數人民的好處。法國的農民，以前不啻貴族僧侶的奴隸，一年到頭，手胼足胝，而自己所能享受者，不及五分之一。此外還須爲他們做強迫的義務工。經濟的自由主義加上政治的自由主義，使他們在頃刻之間，摔脫了這些無理性的束縛。再如受行會規例束縛的普通工人，手藝工人，和小商人等，以前迫着要屈服在舊制度舊方法之下者，也把這種阻礙進步的障礙物摧燬。運用他們的才識智能，發展個人幸福。英國政府算是最聰明，他們不待人民用政治手段要求經濟自由，便全盤接受經濟的自由主義。保

96620 障個人自由競爭，實行國際自由貿易，政府不干涉人民經濟活動，更不准人民團體妄加干涉。他們避免了許多無謂的挫折，很順利的一步步

發展。執世界工商業之牛耳。美國自獨立告成，經濟自由主義，更發揮得淋漓盡緻。他有無窮的富源，肥沃的土地，到處是森林，到處是礦藏。但人口極稀，一七九〇年調查，全國僅三百九十二萬餘人，國土八十九萬餘方哩，平均每方哩僅四人有奇，一八〇三向法政府買入路西愛娜土地（Louisiana）國土幾增一倍。而人口不過五百五十餘萬，平均每方哩僅三人有奇。他們個個都有創造的機會，個個都可以做富翁。只須有一技之長，能持之恆久，除極少數的例外，幸運都在眼前等候他們。他們對政治自由的爭持並不力，選舉時表示其政權在民，便引為滿意。經濟自由，卻一刻不能放棄，誰侵犯他的經濟自由，他馬上和誰拼命。

恰巧有達爾文生物互競適者生存的理論，為經濟自由旁證，認為自由競爭落伍者，都是惡劣分子不妨讓他吃苦，甚或讓他消滅，因之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更為普遍，毫無限制。比如當時英國工人的工作時間，長至每日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工廠衛生與安全，毫不注意，工人進退，一聽雇主自由，童工女工，各業均得雇用，今日吾人認為違背人道，妨害社會者，當時均得以自由競爭作護符，不受任何限制。工人聯合向雇主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等行動，均認為非法，因為那是一種恐嚇的行爲，有害雇主的經濟自由權的。直至一八二五年，英國會纔通過承認工人團結的法案，一八三三年頒布第一次工廠法，限制女工童工的雇

用，一八四二年頒布礦業法，禁止礦主雇用女工和十歲以下的童工。但這些限制，仍舊是很寬格的，一般人認為神聖的，還是自由競爭。

法國工業發展較緩，美國於十九世紀初葉正忙於開發西部，注重農業，對於自由競爭的限制，比英國更遲。法國政府至一八六四年纔正式承認工人團結罷工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於一八四五年判定工人聯合向雇主要挾為妨害商務，違背憲法，一八六六年，麻省州議會通過一種法案，限制十四歲以下之童工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每天八小時。但各州和聯邦議會通過關於限制資本公司或維助工人的法案，常被最高法院認為違反契約自由，判決取消。至於工業發達較遲的德意奧等國，接受經濟自由主義比較遲緩，但其深入人心，為一種公認的原則，則幾乎到處相同。

當時政府不但不干涉個人經營，而且處處設法幫助，如英政府對棉織業，航海業之津貼，法政府擔保鐵路投資的利息，美政府津貼聯太平洋鐵道建築費每哩一萬六千元至四萬六千元，並給予鐵道兩旁之十哩以內之土地等。又如各國政府以兵力保護海外僑商，獎勵發明改革，准予註冊專利等，卻有利於人民之經濟活動者。

總之，自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是經濟與政治分道揚鑣的時期。就學理言，經濟學從政治學中分出來，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就事實言，一般人民掙脫了統治階級對於經濟行爲的種種束縛，政治以保障自由競爭與不干涉個人經濟自由爲原則。

## 四 第二時期——經濟的政治

自由競爭與私產制度因歐洲民族之前進，科學之發明，與市場之擴張而形成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態後，他便發生許多流弊，比如（一）窮富階級的劃分。資本家直接操縱社會生存的經濟權，間接操縱保障社會的政治權，勞動階級則成爲資本家的牛馬。他們剛解脫了政治的壓迫，又陷入經濟的重圍。（二）生產過剩與失業恐慌的矛盾現象，一天天加劇，廔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三）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而成帝國主義，引起帝國主義間不斷的戰爭，與帝國主義殘賊弱小民族之卑劣史跡。（四）其他連帶發生之惡果，如都市黑暗，工業危險，罪犯增加等等。所以當經濟的自由主義發展到極度時，他造成一個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其中有光榮，有勝利，有進步；但也有苦惱，有悲哀，有罪孽。

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逐漸進而支配政治，一方面有資本家之操縱政治，他方面，有資本主義的弊害所激起的社會反動力，結晶於社會主義的運動。

資本家操縱政治，並不明白地說出的。他們惟一的方式，便是堅持自由競爭的主張，佐以經濟地位的優勢，直接間接地操縱政治，影響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尤其容易表現他們的神通。近代民主國家之佔政治勢力者，不是叱嗟鳴呼不講理的軍人戰士，也不是力難縛雞，家無恆

產的白面書生，而是大腹便便的資本家。選舉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方式，但任何人希望當選，除出他個人的能力聲望外，必須有兩種物質的條件相補助。一則要有良好的宣傳機關，二則要有一筆巨額的活動費。宣傳機關不完備，社會便不能明白你的主張和辦法，便難望當選。但是辦宣傳機關多半要貼錢，報館、學校、教堂、社會團體等等，均須定長維持，而後緊要時得運用裕如，正如用兵一時，必須養兵千日，平日不養，即無可用。這種貼錢的生意，誰能和資本家競爭呢？活動費包括交通、郵電、印刷、交際及辦事員之生活費等等。今年美國總統競選，民主黨本部的費用報告，共一百六十餘萬元。各地黨部用去者，自不止此數。一九三〇年芝加哥麥高密夫人運動參議員選舉，初選完結，已用去七十餘萬元。諸如此類，赤手空拳者，怎能和他們競爭？不管選舉的理論怎樣完美，事實上總是給資本家以最大便利。

又如政府官吏的薪給制度，也有許多限制窮人的地方。美國外交官吏的薪水公費，是最好的例子。據聯邦政府商務部出版的統計年表註明，凡擔任駐外公使大使者，起碼每年應有一萬元的私人收入，方數應用。美國駐外大使館的最大預算爲十九萬五千元。而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駐英大使每年所付的房租雜費，即達十六萬元。倘無私人津貼，怎能維持？各國議員的薪給，也不弱。議員們合理的開支。一九三〇年，英國工黨議員當選者很多，議會開幕，必須穿燕尾服。他們卻沒有錢買禮服，窘迫萬狀。

9662

但資本家自己並不願意做官，他們不能把寶貴的光陰爲「等因奉此」而浪費。美國尤爲顯著，經商起家，中途改入政界者，常被人瞧不起。在政治上活動者，只是二三流人物，第一流人才卻多半在工商界。資本家要操縱政治，又不願做官，於是白面書生，叨了不少便宜。他們一方面受資本家的御用指揮，一方面粉墨登場，扮演各種悲劇喜劇。美國的共和黨，法國的民主黨，英國的自由黨，其最著者。

資本家干涉政治的動機到底怎樣呢，我敢說純粹是經濟的。

開宗明義第一項，就是要御用政治的力量，保障現有的經濟制度——私產制度，與自由競爭。消極方面，他們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制止各種侵害產權與阻礙自由競爭的行爲。盜賊不消說要嚴厲制裁，欺騙、恐嚇、毀約、胡賴等不適用於各人經濟之順利發展之行爲，一樣地要受制裁。全部商法，便是保障私產制度與自由競爭的最有效的工具。積極方面，他們更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鼓勵或補助私人經濟之發展，比如新發明之專利權，大企業之國家補助等。有政治力量作護符，然後可以安心放膽於經濟事業之開發。倘有人想根本推翻現有的經濟制度，他們決不惜以政治力量掙扎到最後一刻。

其次，資本家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保護其經濟領域內市場獨佔的利益。關稅政策，卽此種需要的結晶。資本家沒有一個反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但很少贊同他國際自由貿易的主張。他們知道有許多事業，不能和外人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競爭，正如勞工不能和資本家

自由競爭之情勢相同。於是建築起高高的關稅壁壘，限制外貨的輸入，保證國土內之獨佔市場。而且他們很聰明地把他關稅政策解釋成保障民族生存，和保障工人工作的辦法。不知工人所得者少，國家所得者少，大部份好處，均入資本家之荷包也。（自然，中國絕對需要關稅保護，但我們的關稅政策，應側重於國家資本之保障，而不必過於保障私人資本之發展。）

更進一步，他們不以保障本國市場爲滿足，還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保護或開展他們在殖民地 and 弱小民族的經濟利益。資本主義下之生產速率，常超過社會一般的消費速率（因爲資本家分去的巨額的購買力，只能用一小部份）生產過剩，成爲必然的結果。最好的救濟，就是把過剩的物品，投資給工業未發達的國家，以他們的購買力，代替資本家儲存不用的購買力的部份。但這種能殺消剩餘貨品的尾閘，人人垂涎，非有政治力量爲後盾不可。英之於印度，南非，美之於菲律賓，及南美各國，法之於安南，日之於朝鮮，等等，均以政府力量，保障私人開發經濟之機會，十九世紀中葉後，殖民政策復風行全球，卽資本主義已發展到需要殖民地的明證。還有，上面所說的資本家賸餘下來的大部份的巨額購買力，便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要運用才能生利，但資本一多，國內不易得到有利的投資機會，他們不得不向外找尋出路。國外投資的利息比較高，但有時儉難不着丟把米，連本錢也收不回。在這場合，投資者需要政府的保護，外交的或者實力的，現在國際投資多由政府

進行，即有私人投資，也由政府幫助，由政府保障。美政府常用軍事力量保護美人在南美各國之投資利益。蘇俄革命，否認俄皇時代的一切外債，法人損失達十萬萬法郎，故當時法政府反俄最力，現在仍千方百計幫助白俄，想推翻蘇聯統治，恢復已失權利。

從上列三方面看，可以證明政府對於資本家之功用，明瞭其關係之深，即知其追求之切。十九世紀中葉後，資本家一步進一步地操縱政治。而其操縱政治之動機，則完全是經濟的。

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資本家操縱政治，但資本主義的弊害，也引起反資本主義的勢力，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勢力。

社會主義乃是經濟學的新發展，是根據經濟理論與追求經濟平等的經濟主張。普通經濟學只說明經濟現狀之「什麼」與「為什麼」，社會主義同樣說明經濟現狀之「什麼」與「為什麼」，但尤側重於「應該怎樣」。若以普通經濟學比之於藥物學，社會主義就是病理學。社會主義的方法雖不盡同，但他們的目的完全相同，就是要變更現有的經濟制度，使之合乎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他們認清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多數主張利用政治力量，改革經濟制度。就現有政治系統，以謀逐步改革者，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也稱為改良派。主張由勞動階級奪取政權，然後謀經濟改革者，為急進的社會主義者，也稱革命派。但不論溫和、急進、改良、革命，他們之欲利用政治勢力，以達到經濟改革則同。他們的手段是政治的。動機則完全是經濟的。

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是多數公認的社會主義的鼻祖。但在馬克思之前，也有一班先趨者，穆兒 (T. More 1478-1535) 寫烏託邦時，明白咒咀私產為一切罪惡之源泉，康潘尼拉 (Campanella 1568-1639) 於一六二三年出版之太陽之城，也有同樣主張。十八世紀中葉後，經濟自由主義盛行，產業日益發達，私產制度與自由競爭的弊害愈顯，攻擊者更是言之有物。聖西門 (St. Simon 1760-1825) 與其門徒，和白浪 (Louis Blanc 1813-1882) 首先很具體很明白地鼓吹經濟改革，他們反對私產制度最激烈，並主張政府干涉私人經濟活動。他們認為人人都有生存權和工作權，倘有人妨害這種權利者，政府應予以切實之保障。聖西門之徒，並主張個人遺產，只能由政府承領，再由政府分配其用途。

同時有所謂合羣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富利阿 (C. Fournier 1772-1837) 奧文 (R. Owen 1771-1858) 卡倍 (E. Cabet 1788-1856) 等，他們否認現有的經濟制度，但不主張用政治力量求改革。他們希望人民自動起來，組織以公財共產，互助合作的小規模的社會團體。這種社會以政治的自治與經濟的平等為最高原則。他是個別獨立的，規模很小的，所以無庸另設政府機關。奧文，於一八二五年去美，曾試驗其理想，結果損失二十萬元，完全失敗。富利阿的主張，也會在美國作一度實驗，他們的主張之不易收效，大概是太注重個人意志，太注重人道，充類至盡，便有後來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之無政府共產主

這兩派是馬克思以前談社會主義的代表，不管急進派與合羣派的主張如何不同，他們因經濟思想而影響政治主張則一，聖西門、白浪等主張政府干涉自消說，奧文等為追求經濟改革，根本懷疑政治那玩意兒，何嘗不是經濟影響政治的顯例？

不過他們只能稱為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他們的看法和主張，實在太不澈底，比如聖西門、白浪等主張政府干涉，而不知政府本身，就是資本家的御用品，奧文等希望在惡劣的大環境中創造理想的小環境，而不知大環境的惡勢力如未打破，小環境的理想局面決不會實現，即使實現，也不能持久。他們的思想，多少帶些玄學的色彩，馬克思稱他們為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者，不算冤枉他們。

馬克思主義之擡頭，安下了近代社會主義的礎石，也是經濟理論大踏步侵入政治範圍的開端。他的資本論於一八六七年出版，近年來國人介紹者很多，無容詳細敘述，姑舉三點，以賅括其真諦。

(一)以物觀解釋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他的經濟理論，政治主張，均根據物觀的解釋。馬克思認為人類一切行動思想，全受物質的影響。最簡單的如肚子餓，自會引起覓食的行動，身上冷，自會引起取暖的行動，找不到，自然只有向他人爭奪。個人如此，階級如此，國家民族也如此。仁義道德，全是根基於某一部份人的物質利益的騙人名詞。所以一部歷史完全以物質為中心，被人們演變成五花八門而已。

(二)以勞動價值論為經濟理論的基礎。馬克思認為各種貨物的價值皆勞動力所造成。比如一疋布紡織者是工人，造紡織機者是工人，種棉花者是工人……隨你分析得怎樣詳細，只有勞動力才是生產的原素。馬克思根據勞動價值的理論，發明剩餘價值的學說，攻擊資本家所得。資本家既不會勞動，即不會生產，其所得者，乃工人工作成效與所得工資兩抵贖餘下來的勞動價值。

(三)以階級鬭爭為政治主張的骨幹。馬克思根據唯物觀念與勞動價值論，認為人類的歷史，乃是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不斷鬭爭的記載。這種鬭爭，有時激烈，有時和平，有時明，有時暗，但在過去的鬭爭中，勞動階級常處於被剝削的地位。他認為勞動階級要求解放，必須採聯合一致，採革命行動，奪取政權，推翻現有的經濟制度。勞動階級的聯合不能限於一國，應與全世界勞動階級一致結合，向剝削階級進攻。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草擬的共產宣言，很激烈地訴請於全世界勞動階級之前，說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革命，只有利益，絕無危害，所能喪失者，只是頸項中一條鐵鍊！

馬克思自稱他的理論，完全根據亞當斯密、卡杜等的經濟學，同時從許多歷史事實中，用歸納的方法找出結論來，所以是最科學的。我們不能附和「馬克思的理論是最科學」的話，他的勞動價值論，和物觀解釋歷史，均犯獨斷的毛病。

馬克思和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均堅持着多數人民的經濟利

益爲政治的標準，（共產政治）主張集合社會上經濟利益相同的分子奪取政權，（階級革命）和絕對不取勸導感化的態度，而專心致志於喚起階級意識，創造力量，以物質條件，支配羣衆行動（唯物態度）等等，都是他們的利害處。資本主義的流弊，早有人指摘，但沒有人能指摘得像馬克思那樣活活現。推翻資本制度的方法，也早有獻議，但總不及他那樣虎虎如生。中山先生曾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而不是生理學家。他能够指出社會的病源，卻忽視了防病未然的方法，批評最恰當。

一八六六年，國際工人聯合會成立<sup>④</sup>，是馬克思主義的初次試驗。巴黎公社於一八七一年曇花一現後，促成馬克思派與巴枯寧派的分裂，國際工人聯合會也於翌年無形停頓，一八七六年，第二國際工人聯合會成立，主張較前轉化，同時各國的社會黨則風起雲湧盛極一時。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縮短歷史的進程。四年惡戰，各國的工人和資本家一同站在戰壕裏爲祖國拚命，毀壞了國際工人的聯合，但同時也引起俄國的革命，（一九一七年）成立第三國際工人聯合會。英法欲以二百萬戰勝軍威踏平赤色蘇俄的計劃不會實現。列寧（N. Lenin 1870-1924）的新馬克思主義，一轉瞬間，卻得到十多年的試驗。列寧的主張，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化，含有充分的權宜性，比如：

（一）藉階級革命獲取政權後，須以階級獨裁，維持已得之政權。  
（二）代表勞動階級的共產黨握政後，可以不必立即實行共產主義，卻可以試試「新經濟政策」，有條件地承認私產制度之繼續。

（三）勞動階級革命，不必如馬克思所言，待工業發達至相當程度時，才能進行。工業不發達的社會內，也可進行階級革命。只須革命之後，力事建設，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而且集權的，計劃的經濟建設，比較任的，無政府的經濟建設，更爲有效。

列寧主義之以經濟爲骨幹，以政治爲手腕，更爲明顯。他一方面以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爲基礎。同時非常注重政治策略。我們可以這樣說，列寧主義，是從馬克思主義胚胎出來的經濟的政治學。

與馬克思同時及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當然不限於馬克思與列寧所代表的激烈的一方面。比較溫和的，德國有羅勃脫斯（J. K. Robertus 1805-1875）拉薩爾（F. Lassalle 1825-1864）等主持之社會民主黨。英國有魏勃夫婦（Sidney Webb 1859-）蕭伯納（G. B. Shaw 1865-）等自一八八四年開始的反對流血的法邊社運動（Fabian Society）和潘梯等（J. A. Penly 1875-）於二十世紀初年發動的反對私人操縱同時反對國營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運動。法國有溶合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工團主義。各派主張，雖不及馬克思派之明顯的以經濟利益支配政治，卻沒有一派不站在經濟的立場，決定其支配政治的態度。

96626  
 綜上各點，可以證明近代資本家的集團，和反資本家的勞工集團，都想利用政治的力量，以增進其個別的經濟利益。兩者的利益既如此

針鋒相對，照理，兩者似應互趨極端。然而歷史詔示吾人者，還是兩方容忍退讓，不為己甚，以求經濟利益調和的事例多些。資本家見得社會不平已甚，人民忍無可忍時，便退後一步，放鬆一步，以維繫社會之平安——也就是維繫他們自己的利益。勞動工人呢？原是勞動慣的，他們不妄想一步升天。除蘇俄因特殊領袖，特殊機會造成的例子外，普通勞動集團當他們所爭持的權利得到相當滿意時，常遷就容忍，不為己甚。所以資本家集團與反資本集團的利益，骨子裏雖然十分衝突，實際上則衝突之後，仍常回到協調的路上去。不斷的衝突，不斷的協調，促成近代歐美社會之進步。經濟利益衝突協調之結果之表見於近代政治，與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截然不同者，可就下列幾點簡略說明之。

(一)關於立法的。上面曾經說過，英國政府於一八二五年承認勞動團體之組織，一八三五年頒布工廠法，但這兩種法令，當時並不算完備。其他國家，則連不完備的也付缺如。十九世紀中葉後，英國的勞動立法，才接二連三地增添修改，成爲一部完美的勞動法典。其他國家，因經濟之轉變，也適應時代潮流，逐漸完成勞動立法。勞動立法的一貫精神，即承認勞動階級在現代經濟制度的競爭場中，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而予以法律上特殊的保障。如承認勞動團體之聯合行動，罷工權利，縮短工作時間，規定工場之衛生及安全設備，限定最低工資，強逼勞動保險，

限制童工女工等等。一方面保護勞動階級身體與經濟的利益，一方面限制資本家經濟自由權之行使。

(二)關於政權者。近代民主社會的人民管理政府的主要方法，就是選舉。但以前的選舉方法，一則對於選舉人的資格限制很嚴，有財產的限制，有教育的限制，而婦女則根本沒有選舉權。但近代政府工作範圍，一天天擴大，處處與個人經濟上發生關係。如若政府的產生，由少數人包辦，怎能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選舉制度的原有的許多限制，終於抵擋不住大多數人的經濟要求，普選的呼聲，很響亮地喊出來。現在雖尚未完全實現，但各國選民的範圍，均一天天擴大。婦女的選舉權，則完全確定。一九二五年與登堡當選德國總統，與美國歷屆選舉之能維持禁酒原則，得力於婦女甚大。以往選舉制度之另一弊病，在過於重視代表制。轉輾代表，便失卻代表性。人民的真意，經過一級，減淡一成，結果便宜了一班流氓政客。爲保障大多數人利益計，直接選舉，的確比較合理些。從代表選舉制，逐漸轉變到直接選舉制，也是近代政權轉移之有利於大多數人民的趨勢。

(三)關於政黨組織者。自英國成立議會，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後，各國政黨組織，常以一種空洞的政治理想爲目的，如各國之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等。當時很少注意到社會階級與政黨的關係。有之，也不過是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之分。如英國上院限於貴族，下院限平民。法國也有參衆兩院之分，(美國參衆兩院之分別，在調和各州代表人數多



寡之爭，參院每州兩人，衆院以人口多寡爲比例，此當別論者。）這些都是政治階級的劃分，而不是經濟階級的劃分。十九世紀中葉後，各國政黨才逐漸採取經濟階級爲組織的原則。最明顯的，自是上面所述的各國社會黨。不論採溫和手段或激烈手段，他們都以改進大多數人之經濟利益爲主要政綱。各國社會黨的勢力，一天天擴張，社會黨因手段溫和急進之不同，在一國中又常分成幾個不同的但能獨樹一幟的社會黨，各工黨，社會民主黨，急進社會黨，共產黨等等。我們可以這樣說，從前的政黨，是政治的政黨，現在的政黨，是經濟的政黨。

(四)關於政府政策者。從這方面看，更可找出許多爲百年前的政治家所夢想不到的事實。(甲)大企業國營，或受政府之監督。關係全國經濟命脈，足以操縱社會的大企業，如鐵道，鑛山，銀行，郵電，及各種基本工業，均以國營或國家監督爲原則。最自由的美國，自一八九三年起，也開始限制托辣斯之類的組織。(乙)公用與公益事業市營。公用事業如自來水，電燈，煤氣，市內交通，娛樂場所等，公益事業如衛生，防疫，醫院，養老恤孤，瘋人殘廢，兒童教育等均由城市政府經營監督。(丙)補助貧苦人民。如救濟失業，失業保險，職業介紹，移民墾荒等等，均爲現在政府之重要工作，英政府於一九三〇年撥付失業救濟的基金，達一萬萬鎊，幾佔全部開支五分之一。最近因減少各人救濟金額，失業工人便騷動起來，幾乎鬧進皇宮去。(丁)各國政府均努力於本國生產之保護獎勵，生產產品之推銷，和物價之調節。其表現於對外者，有關稅政策，賤價投資，殖

民地競爭，與最近之國際經濟會議等。其表現於國內者，有補助現金，給予特權，收買賸餘物產，推進合作事業，注重調查報告，提倡實業教育，設立試驗場所，指導各種方法等等。(戊)因政府政策之不同，政府組織也隨之變更，關於農工商的專部專局，逐漸增添。其重要不亞軍事財政。上列幾項，僅舉出現今政府工作與前不同的幾種重要例子而已。

(五)關於賦稅制度者，帝王以國家爲私產的時代，賦稅只是人民對帝王應盡的一種無權利的義務。轉到民主社會，賦稅征收，便須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並須明定用途。這是賦稅制度的第一變。以前征稅原則，常按人征收平均分擔，特權的貴族階級，倒反可以免稅。十九世紀中葉後，征稅應按納稅人能力之大小而定稅率之高低的原則，逐漸確定。同時並以賦稅制度，實現各種社會政策。這是賦稅制度的第二變。第一種改變，表明人民政權之伸張。第二種改變，則根據於大多數人民之經濟利益。近代稅制如所得稅，遺產稅，資本稅，奢侈品稅，土地增益稅，公司營業稅，酒煙稅等。免除窮苦人民的納稅義務，而且多數稅制，均適用累進稅率，進益愈多者，稅率愈高，納稅愈大，歐戰時，英國所得稅率，最高者爲每鎊六先令，外加附加稅四先令，每鎊收入，須繳半鎊給政府。當時美國所得稅率更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所得稅收入，在近代國家收入項下，占極重要地位。英國所得稅佔全部歲收五分之一。美國一九三〇年聯邦政府收入爲四十一萬七千八百萬元，所得稅二十四萬一千一百萬元，超過二分之一。遺產稅率也很高，英美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將來一

96628 定還要逐漸提高，節制不勞而獲的私人所得。再則以前各種不合理的增加平民負擔的稅制，如內地關稅，糧食稅，鹽稅，人頭稅及各種容易轉嫁之間接稅等，在歐美進步的國家，幾乎絕跡，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值得誇耀的。

(六)關於教育者。教育的改變，也和賦稅制度之改變差不多。君主時代，教育只是培植統治階級子弟的工具，以前中國採科舉制度，已算很開明。民主革命後，自由為一切政策的基礎，教育也沒有例外。但送子女入學必須負擔教育的經費。窮苦的人，雖有享受教育的自由，但無法去享受。德國人早看到這層道理，十九世紀初葉，即確定義務教育的辦法，政府供給開支，人民子女須強迫入學。英政府直至一八七〇年，政府至一八八一年才先後規定義務教育的辦法。現在各國都定有六年或八年的義務教育。父母必須送子女入學，學校開支由政府負擔。政府辦教育的錢，取之於人民。照現在的賦稅制度，實取之於少數富人。而入學兒童的父母，則大部份是免稅或納稅很微的平民。換句話說，就是拿富人的錢，教育平民子女。社會之進步，繫於全社會人民之智識程度。教育之社會化，乃歐美社會進步的基礎。

總觀上列幾種例子，可以明白近代歐美政治與經濟轉變的關鍵。資本家的集團並不走極端，反資本家的勞動集團，也不常走極端。他們互相牽制，互相角逐，隨時衝突，隨時協調。今後兩者之衝突，將日趨激烈，抑仍採協調，我們不敢武斷。不過他們的社會基礎，日益強健，普通人民

之教育，公德，自治，合羣等，均有長足之進步。即使激烈，也不致焚燒搶殺，破壞一切。就美國而論，不流血而完成經濟革命的最後階段的可能很大。他們的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很起勁，很理性。只要方法是好的合理的，他們常願意採取。將來逐步演進，未嘗不可達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法國流血革命完成民主政治，英國不斷演進也達到民主政體。蘇俄用激烈手段實現經濟革命，美國也許步武英國政治演進之方式，不訴之激烈手段，一樣地完成經濟革命。

衝突也罷，協調也罷，惟一的特質，就是經濟利害影響於政治，逼得政治思想和政府設施不得不隨經濟的趨向而改變。不論從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行動看，從資產階級操縱政治的事實看，或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相協調之結果看，都足證明最近七八十年歐美各國的政治，乃是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成為政治的精髓，經濟利益為政治設施的準繩。

## 五 結論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得到一個最簡單明瞭的推論，那就是，談經濟者必須懂政治，談政治者，尤須懂經濟。

談經濟者不懂政治，最易流於空虛，抓不住經濟的真實意義。比如正宗學派的經濟學者，至今還捧着亞當斯密的經典，高談純粹的經濟學，維持私有財產與自由競爭的主張，而不知一般人的經濟利益，早已大踏步侵入政治範圍。自由競爭，尤為經濟地位不如今日之各別個

人所能享受。又如烏託邦派與無政府主義之社會主義者，雖計劃好一理想的樂園，卻忽視了達到樂園的道路的敷設。他們有玄高的理想，但忽視或否認政治力量，因之他們的理想也無從實現，始終是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再如蘇俄革命後之共產黨左派，不顧本身力量之充實，共產黨應如何在蘇俄先立基礎，而高談世界革命。中國共產黨尤不顧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中國社會之實際狀況，附和階級革命，妄想一步升天。所以談經濟者不懂政治，必陷於空虛玄妙，非驢非馬。口口聲聲為多數人之經濟利益，結果仍無補蒼生。

談政治者不懂經濟，尤易釀成悲劇。因為政治的力量，比經濟的需求容易表現，政治違背了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就是製造革命的因素。就政治言，自然是自殺，但這種自殺，必須經過一定的過程。而在這種政治自殺的過程中，全社會全民族的經濟利益必蒙極大的損害。而且政治適應經濟的需要，不僅指為政者能努力或保障經濟事業的意思。他們不但要努力，要保障，還要努力得合理，保障得恰當。缺乏經濟智識者，決不能認清某一社會某一時期，各種經濟建設之先後緩急，各種經濟原則之抉擇取舍。所以不懂經濟原則和經濟需要的政府，常陷入兩種錯誤：一是浸淫於違背大多數利益的虐政——就是反動；一是碌碌於

出力不討好的錯誤的經濟建設——就是亂動。反動與亂動，促成政府的滅亡，也戕賊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山先生說，民生為革命的終極目標。不能改進民生，便是革命失敗。

讀者或許願意追問，處今日之中國，談經濟者到底應抱什麼政治態度，政治建設又應以什麼經濟原則，經濟計劃為基礎？這是中國民族的根本問題，非本文的範圍，也非倉卒所能解答，留待將來討論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於柏克利。

- ① Serra. Brief Treaty on the Causes which Make Gold and Silver Abound—Kingdom where there are no Nines 1613.
- ② J. A. P. Marriott: The Re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 1909 p. 16.
- ③ 當時法國人頗醉心於中國之道德制度，孟德斯鳩之「法意」中，常流露此種口吻。
- ④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後稱第一國際。
- ⑤ 一九二七年美國人口共一八、一四〇、五五〇人，那年繳納所得稅者，共四、一〇一、五四七人，和二五九、八四九公司。就人數比較，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強，而所得總額則佔聯邦稅收百分之五十四強。又納稅者之中，每年收入在一萬以上者共三四二、〇七九人，占繳納所得稅人總數百分之八強，而他們的納稅總數則佔所得稅總額百分之四十五強。參閱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United States, 1930, by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Government.

